

15-16世紀葡萄牙人在東非的征服與貿易

張海鋼*

伴隨着地理大發現後葡萄牙在東非的征服，15-16世紀葡萄牙人在東非的貿易也大致經過了兩個階段：黃金貿易和象牙貿易。但由於葡萄牙人從來就沒有制定任何明確的政治和經濟政策來管理東非，這就造成葡屬東非在17世紀裡發展以及改革的困難，並最終導致葡萄牙退出東非的歷史舞臺。

歷史上的東非地區在葡萄牙人東來之前，就已經發展了自己獨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一系列有特色的商業城鎮分佈在交通便利的海岸上。沿岸城鎮之間宗教和文化的同一性，加速了城鎮之間的經濟交流，也促進了各城鎮之間的商業競爭。儘管某個城鎮在某個時期可能在政治上或者商業上壓倒其它的城鎮，但東非地區從沒有形成一個海岸帝國。隨着通往印度新航路的開闢和葡萄牙人的東來，東非地區穩步發展的態勢被打破，東非的發展也進入了動盪時期。

引言

葡人東來之前的1500年左右，東非地區因積極參與日漸擴大的印度洋貿易而正處於發展的“黃金時代”。

基爾瓦（Kilwa）在15世紀處於穩定發展時期，向南控制着遠至索法拉（Sofala）的黃金和象牙貿易，海運貿易一直是其經濟的重要基礎。至15世紀末，基爾瓦走向衰落，並逐漸喪失對“金城索法拉”的控制權，內部統治也漸趨不穩，遂招致外來干涉。早在1454年，桑吉巴（Zanzibar）

就試圖將自己提名的人選強加給基爾瓦。不過此時的桑吉巴本身也分裂為幾部分，每個部分都有自己的統治者，因此無論政治還是經濟上它都不是東非海岸地區一個起主導作用的城鎮。

蒙巴薩（Mombasa）作為東非地區一個起主導作用的城市，到1500年已成為斯瓦希里海岸（Swahili Coast）最大的港口。它不僅與許多商站有貿易往來，同時，它還是來自南部、北部和西部的生產者進行黃金和象牙貿易的中心。⁽¹⁾葡萄牙人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東來之時發現蒙巴薩已是一個貿易興旺的大城市，它的商人在遠至安哥謝（Angoche）的南部海岸地區的商業活動中都扮演重要角色。

蒙巴薩（Mombasa）的貿易對手馬林迪（Melinde）在1500年也是一片繁榮景象。它的貿易主要是基於象牙出口，其次是販賣諸如從索法拉而來的黃金，以及蜂蠟、龍涎香和樹脂等物品。⁽²⁾

馬林迪的農業較發達，在16世紀就擁有由奴隸耕作的穀子和稻穀種植園。早期的葡萄牙殖民者對此印象深刻，雙方建立同盟關係後，馬林迪成為葡萄牙殖民者淡水和食物的供應地。處於海

*張海鋼，廣州暨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世界史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葡語國家和地區史研究。

岸最北端的摩加迪沙（Mogadishu）也是一個富商居住的巨大城邦，此城的商人輸出本地的毛紡品和棉紡品，在沿海城邦和內地之間進行貿易。⁽³⁾

這些較大的商業上的極為突出的城鎮中，索法拉、基爾瓦、馬林迪和蒙巴薩的商人在非洲內陸和印度洋的國際貿易中極其活躍。事實上，這些城市的商人在1500年左右就在遙遠的麻六甲銷售東非的貨物，諸如象牙、黃金、樹脂和龍涎香，帶回棉花、絲綢和錦緞，這些貨物通過聯繫海岸各地的商道滲入許多沿海和內陸城市。當然，阿拉伯、印度甚至印尼的船隻也會到達東非地區進行貿易。⁽⁴⁾基於歷史上阿拉伯帝國擴展的原因，之前就有大量的阿拉伯人來到東非。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當地的非洲人與前來貿易和定居的阿拉伯人不斷融合，到15世紀時，阿拉伯人在斯瓦西里海岸地區的定居點因為貿易的繁榮而發展迅速。特別是索法拉，因為交通便利，大量阿拉伯穆斯林長期在此定居，並和大陸內部的異教徒開展貿易。一般情況下，來自基爾瓦、馬林迪和蒙巴薩王國的摩爾人（Moors）會把大量染色棉布、少許白色與藍色棉布、一些絲綢和用大船從坎貝王國（Kingdom of Cambay）運來的灰、紅和黃色的珍珠帶到索法拉。⁽⁵⁾他們用這些貨物交換非洲大陸內部出產的黃金，因此索法拉的黃金貿易非常興盛。

與阿拉伯人一起來到東非的不僅有貿易，還有他們的信仰——伊斯蘭教。在其影響之下，東非地區不同的民族逐漸融合，並形成了一個新的文化共同體，即後來所稱的斯瓦西里人（海岸民族）。但東非地區文化和宗教上的同一性並不意味着東非地區政治上的統一，相反，東非地區的城市在政治上高度獨立，但這種局面隨着葡萄牙人的東來而逐步發生改變。

15-16世紀初的征服：黃金貿易時期

葡萄牙人開始探險航行之時，與穆斯林的交戰仍在繼續。葡萄牙人探險的動機是從商業、政

治、軍事和宗教上包抄穆斯林，打破其對通往亞細亞和中國商路的控制，聯絡其他基督徒以拔除在任何地方發現的穆斯林統治。當然，葡萄牙人也認為穆斯林無權佔有財產，並試圖接管所有穆斯林的領土。地處北非的摩洛哥與當時的海上霸主葡萄牙的距離最近，因此成為葡萄牙對外擴張的首要目標。事實上，為了掠奪土地、奴隸和控制黃金商路，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Infante D. Henrique）早在1415年就曾率軍在北非摩洛哥的休達城（Ceuta）與穆斯林作戰，這標誌着葡萄牙所引領的歐洲對外擴張時代的開始。此外，葡萄牙人從北非的馬格里布獲悉阿拉伯穆斯林曾通過海路到達東非，因此他們也想從海路到達東非，打敗那裡的穆斯林，轉而控制一直掌握在穆斯林手中的貿易。

為了實施這個計劃，一支支探險隊不斷踏上征程。1498年1月，瓦斯科·達·伽瑪的率領的船隊繞過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到達了斯瓦希里海岸最南端的克利馬內（Rio dos Bons Sinais）河口。隨行船員 Álvaro Velho 在手稿中記載：“在此停留的32天時間裡，我們清洗了船隻，修理了聖·拉法埃爾號（São Rafael）的桅杆，補充了淡水，並在離開之前在該地立起了以運載船隻聖·拉法埃爾號命名的石柱。”⁽⁶⁾3月2日船隊抵達莫桑比克港（Mozambique），當地的統治者謝赫（Senhor）對來客表示歡迎，並在隨從的陪同下經常登上船隊的不同艦隻。但在發現船員們不是穆斯林後，謝赫便對他們有了猜疑。達·伽馬則“深信穆斯林陰謀破壞他的船隻，並對那些他所認為的敵人採取敵對和戰鬥的姿態”，⁽⁷⁾海岸穆斯林與葡萄牙人由此發生了第一次衝突。由於風向不利，達伽馬旅途中沒有到達基爾瓦。4月8日船隊到達蒙巴薩時受到歧視，因為葡萄牙人與莫桑比克人衝突的消息已先於他而到達此地。見勢不妙的達·伽瑪率艦隊繼續北航，4月15日抵達馬林迪，並受到謝赫的歡迎。謝赫把葡萄牙人看成抵制競爭對手蒙巴薩的潛在同盟，馬林迪和葡萄牙之間長期的友好關係也自此建立起來。⁽⁸⁾在其提供的阿拉伯領航員

穆罕默德·伊本·馬吉德 (Mohammed Ibn Majid) 的引領下，船隊順利抵達印度西海岸的商業重鎮卡利卡特 (Calicute)。8月29日滿載香料、寶石和絲綢的船隊離開卡利卡特，開始返航。在再次抵達東非沿岸的摩加迪沙後炮轟了該城，而馬林迪的謝赫則將他的一個臣民送上葡萄牙的大船，作為派往葡萄牙的使節。由於旅途的艱難，僅存的兩條船分別於1499年7月和9月回到里斯本。

達·伽馬的第一次航行證明了從歐洲直達印度的航行既是可能的，又是有利可圖的。同時，他也瞭解了穆斯林在斯瓦希里海岸從事貿易活動的情況，像莫桑比克、蒙巴薩和馬林迪這樣的城市也以其物質文化給葡萄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後這種較大規模的探險又進行了幾次，其中較為著名的是1501年6月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 (Pedro Álvares Cabral) 對基爾瓦的訪問。

跟隨卡布拉爾艦隊一個佚名船員在日記中記述：“這個靠近大陸的小島國家非常美麗，房子像西班牙的一樣高。在這個國家有很多富有的商人，當地擁有大量的黃金、白銀、琥珀、麝香和珍珠。而當地的黑人居民則穿着由上等棉花和絲綢製成的衣服，並戴着許多好看的东西。”⁽⁸⁾雖然葡萄牙人就此窺見了基爾瓦的富裕和貿易，但它的謝赫不願與葡萄牙人合作在索法拉建立貿易代辦處。葡萄牙人認識到，祇有武力才能迫使他改變主意。根據 Gaspar Correia 有關達·伽馬第

二次航行的記載，1502年6月達·伽馬率領的船隊再次抵達基爾瓦港，並以粗暴的口氣要求基爾瓦國王的信使“去告訴你的國王這是海洋和陸地之主葡萄牙國王的艦隊，我來到這裡是為了建立友誼、促進和平和發展貿易。為此，基爾瓦國王



1500年時的斯瓦希里海岸

而不是信使需要過來和我們決定一切事宜。我會以葡萄牙國王的名義擔保在沒有達成協定的情況下，我也可以保證基爾瓦國王來去的人身安全。如果他不過來，我會立刻派人上岸，到他的房子裡把他抓住並帶到我的跟前”。⁽¹⁰⁾在毀滅城池的巨大威脅面前，謝赫被迫同意“成為葡萄牙國王的‘朋友’，並像其他最近變成葡萄牙國王朋友的君主一樣，每年向葡國王交納一定的錢或大量珠寶以證明他們之間的友好朋友關係”。⁽¹¹⁾

繼基爾瓦之後遭到葡萄牙人荼毒的第二個地方就是桑吉巴。1503年，路易·羅倫索·拉瓦斯科(Luís Lourenço Ravasco)在桑吉巴一帶進行搶劫和海盜活動，從準備在那裡登陸的船上劫略了大量的穀物、象牙和白銀，並以武力強迫當地人納貢。

帝國的建立開始於1505年。當時，唐·曼努埃爾(Dom Manuel)任命佛朗西斯科·德·阿爾梅達(Dom Francisco de Almeida)為印度總督，派遣他到非洲的基爾瓦和印度的安傑迪瓦(Angediva)、坎納諾爾(Cananor)和柯欽(Cochin)等地建築要塞，發展里斯本—馬拉巴爾之間的貿易。當阿爾梅達出發時，國王在給他的指示中規定了在東非海岸的基爾瓦和索法拉的活動。艦隊到達基爾瓦後，阿爾梅達以貢品數量不足和

當地統治者沒有昇葡萄牙國旗作為臣服標誌為藉口，直接攻佔了該城，原來的謝赫出逃，葡萄牙人趁勢在該城大肆掠奪。之後，阿爾梅達“扶植在當地頗受敬重的印籍摩爾人穆罕默德·安科尼(Mahomed Ancone)為國王，並讓其騎在馬上隨



東非海岸地地圖

同葡萄牙軍隊一起穿過城鎮”⁽¹²⁾。此外，利用勒索的錢財，葡萄牙人還在基爾瓦建立了要塞，並強迫“基爾瓦把本島所能提供的供應物品以不高於基爾瓦同別處商人交易的價格賣給要塞和海岸的葡萄牙駐軍”⁽¹³⁾。8月13日，阿爾梅達率領艦隊駛進曾經敵視達·伽馬的蒙巴薩港後，“命令士兵洗劫蒙巴薩，並讓每一個士兵把他所搶到的東西帶到他的船上，隨後大量搜出的東西被集中到一起，士兵可以得到這些東西價值的1/20。任何發現黃金、白銀和珍珠的士兵也可以得到1/20的獎賞，為此每一個士兵都用斧子和錘子打碎房門，進屋仔細搜查”⁽¹⁴⁾。蒙巴薩被葡萄牙人洗劫一空，艦隊離開之前，阿爾梅達又下令縱火焚城，大量的房屋在持續一夜的大火中倒塌，數不盡的財富也化為烏有，索法拉和坎貝海上貿易的起點站自此受到了徹底的毀壞。為了避免類似的命運，當時與馬木路克埃及保持良好關係的霍賈（Oja）決定臣服葡萄牙人。布拉瓦（Brava）雖進行了抵抗，但也被征服並遭到了葡萄牙人的武裝劫掠。

攻佔了上述重要城市之後，“葡萄牙人意圖改變直接掠奪的破壞性政策，轉而希望建立一個受其控制的貿易體系”⁽¹⁵⁾，金城索法拉自然也就成為葡萄牙人的下一個目標。1506年阿爾梅達派遣阿尼亞（Pêro de Anaia）率軍抵達索法拉，以突襲方式迅速擊敗當地的阿拉伯斯瓦希里商人，並在此建立起企圖控制黃金貿易的要塞。葡萄牙人起初沒有放逐該地的謝赫，祇要求他臣屬於葡萄牙。如此一來，原來的黃金貿易商或許會繼續來到索法拉向葡萄牙國王的代理商出售黃金。⁽¹⁶⁾當然，葡萄牙也曾期望壟斷索法拉的黃金貿易，之前的基爾瓦就曾因為控制了該城的黃金貿易而盛極一時。有一位葡萄牙商站職員甚至在1506年做出樂觀估計：每年由索法拉出口的黃金可裝載三、四艘船，其價值當在12-14萬英鎊之間。⁽¹⁷⁾然而現實的情況是葡萄牙人從黃金貿易中獲得的收入並不可靠。葡萄牙人對商業的過度控制造成原來在索法拉進行黃金貿易的商人向尚未被葡萄牙人控制的安哥謝海岸的轉移。如以前的索法拉

一樣，大量商人在此定居進行黃金、象牙、絲綢、棉布和坎貝珍珠的交易。來自索法拉、蒙巴薩、馬林迪和基爾瓦的摩爾人在逃避了葡萄牙的船隻後用小船把在這裡交易獲得的黃金和象牙帶走。⁽¹⁸⁾據索法拉商站職員 Diogo de Alcáçova 推測每年大約有“7,750盎司的黃金從安戈謝流出”⁽¹⁹⁾。同時，東非地區內部主要產金國家也因王位紛爭造成商路阻塞，並大大減少了對索法拉黃金的供應，這直接導致索法拉的黃金貿易雪上加霜。

葡萄牙人在隨後的幾年中得自索法拉的黃金數量大減，但這並未動搖他們控制黃金貿易的決心。1511年葡萄牙軍隊對安哥謝海岸進行遠征，燒燬了安哥謝城，逮捕了該城的統治者，驅逐了當地的穆斯林商人，但這些措施並沒能挽救索法拉的黃金貿易。索法拉商站職員 Pero Vaz Soares 在1513年致國王的信中指出：“在1512年10月到1513年6月的八個月是時間內，索法拉商戰通過貿易所得的黃金不會超過1007.5-1085盎司，並且所得的這些黃金還是通過和該城的摩爾商人通過或大或小交易獲得的。內地的黑人和商人來到此地的如此至少，以至於在8個月時間內通過和他們的貿易獲得的黃金不超過77.5盎司。”⁽²⁰⁾

在此刺激之下，葡萄牙人下定決心對東非中部的黃金貿易有一個更透徹的理解。1511年安東尼奧·費爾南德斯（António Fernandes）受命到東非地區中部黃金生產中心姆塔帕帝國（Empire of Monomotapa）進行商業狀況考察，隨後他向“葡萄牙人描述了黃金市場的體系運作和商品交易情況，並且首次指出贊比西河流域港口的重要性”。⁽²¹⁾費爾南德斯的報告動搖了葡萄牙人繼續堅守基爾瓦以控制黃金貿易的信心。鑒於葡萄牙人在基爾瓦能夠榨取的錢財僅夠維持駐軍的費用，1513年基爾瓦要塞的駐軍撤至印度。隨着葡萄牙人的離去，該城的商人與莫桑比克南部的安戈謝海岸進行更多的接觸，以便進一步削弱葡萄牙人對索法拉的控制。葡萄牙人逐漸意識到，要想從非洲的黃金貿易中獲利就必須向大陸內部的產金地贊比西河（R. Zambesi）流域滲透。為此，葡萄牙

人於16世紀30年代冒險進入了內地，先後在塞納（Sena）和太特（Tete）建立了立足點，設置堡壘，留守駐軍。不過，令葡萄牙人沮喪的是黃金貿易並沒有隨着葡萄牙人的進一步滲入內陸而興盛起來。

16世紀中後期的征服：象牙貿易時期

控制東非黃金貿易的失敗迫使葡萄牙人在整個葡屬印度洋帝國的角度重新審視東非地區的地位，葡屬東非進入了歷史發展的第二個階段。為了排擠東非地區此前佔統治地位的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人，確立自己在印度洋的統治地位並進而壟斷印度洋貿易，葡萄牙人在東非地區開始把目光轉向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莫桑比克島。

該島位於莫桑比克海峽的最窄處，同蒙巴薩和基爾瓦一樣，它距離大陸的位置非常近，非常有利於艦隊的航行、停靠和防守。⁽²¹⁾而始建於16世紀初的聖·加布里埃爾（São Gabriel）要塞在被葡萄牙人重新設計以後開始發揮重要作用，一隊葡萄牙士兵駐守於此日夜監守，該要塞還配備有從葡萄牙王國運來的重型火炮。要塞內部有一個蓄水池，兩千個水管把下雨時收集的雨水從屋頂和牆壁送到蓄水池。要塞內部還有彈藥庫和防衛要塞的必要儲備，其中小米和大米的儲備供應特別充分。⁽²³⁾如此一來，這個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最堅固要塞不僅可以為過往的葡萄牙船隻提供安全保障，還可以為船隻提供等待適合航行季風的庇護所。

通常情況下，往返於里斯本與印度的葡萄牙商船路上會在莫桑比克島停留，以獲得“淡水、木材和島上所能提供食物的補給，同時葡萄牙人也可以在此修理往返路上有問題的船隻”⁽²⁴⁾。久而久之，一些服務於船隊和海員的船隻修理中心和醫院也先後在該島建立起來。如果沒有這個港口，從里斯本到印度的跨洋航行是絕對不可能的。莫桑比克島重要性的日益突出，並“開始取代索法拉而成為船隻停靠港口和行政管理中心”。⁽²⁵⁾

但是，一個不可忽略的事實是，莫桑比克島缺乏淡水、可供燃燒的木材以及其他供給，島上所需要的部分淡水、全部的木材和其他供給都來自於島嶼對岸的大陸。為了保證供給，葡萄牙殖民者在16世紀60年代霸權鼎盛時期又以莫桑比克島為基地向大陸擴張，並將其擴展為葡屬莫桑比克殖民地。到此為止，葡萄牙已控制了東非沿岸的眾多重要城市和港口。

葡人力圖控制東非沿岸的目的，不僅是要掠奪財富和從沿岸向內地擴張，而且是要在東方建立一個壟斷印度洋貿易的大殖民帝國。這個帝國以果阿（Goa）為中心，東非是其重要組成部分。為了進行有效的管理，1569年2月，葡屬印度總督佛朗西斯科·巴雷托（Francisco Barreto）被葡王塞巴斯蒂昂（King Sebastião）任命為東非總督，管轄索法拉、莫桑比克和征服地的其他地區。

就在被任命為總督的同一年，佛朗西斯科·巴雷托就“集合了莫桑比克港的所有艦隻，裝載了所有必須的供給以及從貝都因海岸帶來的服務於他和軍隊的大量馬匹、牛和駱駝”⁽²⁶⁾，率領一支一千多人的軍隊從莫桑比克出發，計劃去征服贊比西流域盛產黃金的姆塔帕帝國。由於這次遠征的新奇性和遠征的主要目的是發現金礦，整個里斯本都陷入興奮之中，大量的貴族前來參加遠征隊伍，以至於一部分申請遠征的人不得不留下來等待另一個艦隊。11月份遠征艦隊離開莫桑比克，並迅速到達距其90里格（League）的克里馬內河口（Quelimane River），在此稍作休整後艦隊到達塞納城。塞納城的摩爾人對葡萄牙人的到來極為不滿，並密謀通過毒藥殺死葡萄牙人。充當葡萄牙士兵食物供給的牛在吃了被摩爾人撒了毒藥的草後大量死亡，不明真相的葡萄牙士兵則因食用這些牛肉遭受慘重損失。除此之外，由於熱帶地區疾病的困擾和糧食的匱乏也加劇了葡萄牙士兵進一步遠征的決心。大量士兵在進一步遠征之前就失去了性命，對葡萄牙士兵而言“這塊土地已經成為葡萄牙人的墳墓”⁽²⁷⁾。在此不利情況下，葡萄牙軍隊撤退到莫桑比克，遠征沒有取得預期效果。

為了扭轉巴雷托首次征服贊比西流域的不利局面，1574年葡王任命更有能力的瓦斯科·費爾南德·奧門（Vasco Fernandes Homem）取代巴雷托出任總督。他採取穩步的策略，從索法拉開始一步步向內地遠征。當他擊敗猶特烏（Quiteve），並於1575年到達馬尼卡（Manica）的金礦時卻大為失望。因為“他發現當地非常貧困，如果葡萄牙人佔領金礦就必須支付開採金礦所需的大量費用，還要僱傭大量的黑人從事開採工作”。⁽²⁸⁾這對葡萄牙人而言當然是得不償失。奧門轉而和當地統治者簽訂和平協議，葡萄牙人獲得自由進入王國和不被任何人反對的情況下用商品換取黃金的權利。為保證索法拉和馬尼卡之間黃金商路的順暢，奧門同時也與商路上的必經國猶特烏達成協定。根據協定，以駐索法拉的長官及其繼任者每年向猶特烏統治者交納200塊布匹為條件，葡萄牙商人可以安全地自由地通過猶特烏王國，居住在索法拉要塞的葡萄牙居民可沿索法拉河進入內地，購買生活必需品。⁽²⁹⁾協議簽訂後不久，葡萄牙軍隊撤退到索法拉，僅留一小部分葡萄牙士兵駐守在塞納和太特。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儘管在16世紀60年代末和70、80年代，葡萄牙歷任統治者已經考慮到控制黃金生產中心的必要性，但大多數實際努力都以失敗告終。⁽³⁰⁾

在葡萄牙征服馬尼卡和猶特烏的過程中，贊比西流域的阿拉伯穆斯林受到葡萄牙人的屠殺，商業地位也為葡萄牙人所代替。為了鼓勵葡萄牙人在該地區進行殖民開發，“葡萄牙王室把大量先前穆斯林佔有的地產沒收，然後分發給葡萄牙的宗教團體或個人，並且規定這些地產可以繼承”⁽³¹⁾。久而久之，這些居住在贊比西流域的葡萄牙人的後代和繼承人以非洲人為妻，遵從非洲人的習俗，並逐漸發展成為面積巨大的自治地-普拉佐（Prazo）的領有者（普拉佐羅）。⁽³²⁾這些人從非洲土著統治者那裡獲得政治上的直接承認，然後經葡萄牙王室予以確認。在領地內他們如同德國的君主們一樣，可以對各種案件做出判決，宣判死刑，也可以發動戰爭和強奪土產資源貢物，

所以這些人經常犯下野蠻的罪行。⁽³³⁾為了維護自己領地的權益，普拉佐羅甚至招募士兵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力量，並逐漸取代非洲土著統治者而在事實上實施政治統治。借助於普拉佐的軍事力量，葡萄牙在贊比西流域的統治地位逐步確立起來。1607年姆塔帕新的統治者即位後與葡萄牙人締結了新的條約。葡萄牙人獲准進入帝國的各個地區自由貿易，並“誘惑姆塔帕國王把王國從今以後可能發現的所有金礦及其他的礦藏贈送給葡萄牙國王”⁽³⁴⁾。條約簽定後，在贊比西流域定居和經商的葡萄牙人大量增加，這也為葡萄牙人在東非地區貿易的開張創造了有力條件。

葡萄牙人控制黃金貿易努力的屢次失敗以及戰略重點向莫桑比克和贊比西河流域的轉移，促進了該地區象牙貿易的繁榮。以16世紀30年代莫桑比克取代索法拉成為葡屬東非的行政中心為契機，越來越多的船隻到該島進行貿易，一個以莫桑比克為中心的象牙貿易市場開始取代索法拉的黃金貿易市場而興起。象牙不同於黃金的地方就在於它在海岸的任何港口都可以獲得。因為重量的問題，象牙的買賣不可能集中到一兩個港口，所以莫桑比克總督同斯瓦希里沿岸的一系列小鎮的統治者建立了象牙貿易關係。⁽³⁵⁾到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建立了自德阿戈拉灣（Delagoa Bay）至蒙巴薩、囊括東非海岸的象牙貿易網。一些原先廢棄的居住點也被葡萄牙人重新利用起來並發展成為新的商業中心，最為明顯的是島嶼城市基爾瓦，大量的葡萄牙人因為象牙貿易的利潤而湧入該地。在象牙貿易的刺激下，一些葡萄牙人甚至和原來的敵人如安戈謝港的統治者結為朋友，在該地象牙迅速取代黃金成為主要交易商品。

象牙貿易的發展也催生了東非海岸一些新的貿易中心，比較著名的就是德阿戈拉灣，但該地距離象牙貿易中心莫桑比克島的距離太遠。為了解決運輸問題，急需象牙的葡萄牙商船自1545年起每年一次到這個地區進行交易獲取象牙。

印度洋貿易對象牙的巨大需求，促使葡萄牙商人在東非海岸收集象牙的同時也把目光瞄向了

贊比西河流域。16世紀70年代，葡萄牙對贊比西流域遠征後同當地統治者簽訂和平協議，葡萄牙人在東非進入和平貿易的階段，這為象牙貿易的擴大創造了條件。自此，贊比西河流域也成為象牙貿易的腹地，大量象牙從這裡流向莫桑比克島，莫桑比克島正式取代索法拉成為東非的貿易中心。在正常情況下，來自印度的葡萄牙商船於1月底或2月初到達莫桑比克島，貨物從這裡用小海船運往克利馬內，然後用人力運往內陸或用小型河船運到塞納、太特和宗博（Zimbo），在那裡用進口的布匹和其它貨物換取黃金和象牙。⁽³⁶⁾隨後，來自內地貿易的象牙和黃金在莫桑比克被運到了果阿，這些奢侈品被用於同印度人的香料貿易。⁽³⁷⁾到16世紀末17世紀初，莫桑比克與果阿之間的貿易成為葡萄牙的印度洋商業網絡中重要而有利可圖的一部分。古吉拉特（Gujarat）的紡織品在該地區市場上一直十分暢銷。直到堯人（Yao）在17世紀興起之前，葡萄牙人一直掌握贊比西地區象牙貿易的霸權。

小 結

從15-16世紀的兩百年時間裡，東非地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此期間原來處於獨立發展進程中的東非地區經受了葡萄牙人的入侵。憑藉自身的海軍力量，葡萄牙人自15世紀開始在東非地區建立要塞並試圖創建一個東非帝國。他們建立帝國的收效甚微，因為大部分葡萄牙人認為東非地區遠不如亞洲重要，也沒有給予東非地區應有的重視。這一點的突出表現就是東非地區葡萄牙人比較少，而東非長官在長達兩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一直聽命於印度果阿的總督。這種政治上長期的弱勢地位造成葡屬東非在以後的年代裡面臨困難時改革的步履維艱。

與政治上的附屬地位相伴隨的是葡萄牙人對東非地區經濟上的掠奪和剝削。而最糟糕的是葡萄牙人在東非的兩百年間，從來就沒有在經濟上制定出明確的經濟政策來管理東非地區。他們有

的祇是壟斷黃金和象牙貿易商路的貪慾，即便如此，他們也祇是部分取得了成功。葡萄牙人在東非地區掠奪黃金的願望從來就沒有徹底實現，這一方面是因為東非地區的黃金產量比之西非和巴西確實少得可憐，另一方面是因為東非地區黃金產地的分散，造成開採的困難。象牙貿易在較長的時期內是支撐葡屬東非的主要經濟來源，但在開採金礦的狂熱下，象牙貿易並沒有引起東非葡萄牙人的足夠重視。葡萄牙人在東非無計劃、無系統的經濟管理也造成政策實施的折扣，葡萄牙在東非走向衰亡有其經濟上的必然性。

總之，受葡萄牙人征服和貿易的影響，一些東非城鎮從發展的頂峰衰落，並再也沒有恢復過來，而另外的一些城鎮則發展起來，並一直在東非地區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葡萄牙人在東非存在的歷史特別長，而它在東非地區留下的東西卻驚人地少。一個例證便是，斯瓦希里語中有一些衍生自葡萄牙語的辭彙，它們都是與監獄有關的詞，或者與妓院有關的詞，以及一些紙牌名稱。⁽³⁸⁾但不管怎麼說，葡萄牙在東非地區的殖民歷史對東非造成的破壞，永久地改變了東非地區民族的生活。

【註】

- (1) 佛朗西斯科·本森科特&迪奧戈·拉馬達·庫多：《1400年至1800年的葡萄牙海洋擴張》（Francisco Bethencourt & Diogo Ramada Curto, *Portuguese Oceanic Expansion 1400-1800*），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2007年英文版，頁91。
- (2) B. A. 奧格特著，李安山譯：《非洲通史》，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年中文版，頁588。
- (3) 中國非洲史研究會編寫組：《非洲通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頁134。
- (4) 羅蘭·奧利弗：《非洲中世紀（1400-1800）》（Roland Oliver, *The African Middle Ages 1400-1800*），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1年英文版，頁167。
- (5) Barbosa, *The Book of Duarte Barbosa*，見馬林·紐伊特編譯：《大發現時代葡萄牙與世界的相遇》（Malyn Newitt, *Portuguese Encounters with the World in the Age of Discoveries*），漢普郡，阿什蓋特出版公司2002年英文版，頁32。

- (6) Álvaro Velho: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 見馬林·紐伊特：《大發現時代葡萄牙與世界的相遇》，頁3。
- (7) 馬林·紐伊特：《1400-1668年葡萄牙海外擴張史》(Malyn Newitt, *A History of Portuguese Overseas Expansion 1400-1668*)，倫敦，勞特利奇出版社2005年英文版，頁58。
- (8) A. R. 迪士尼：《葡萄牙和葡萄牙帝國歷史：從原始時期到1807年》(A. R. Disney, *A History of Portugal and the Portuguese Empire from Beginnings to 1807*) 第2卷，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2009年英文版，頁123。
- (9) Cabral's Fleet on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見馬林·紐伊特編譯：《大發現時代葡萄牙與世界的相遇》，頁7。
- (10) (11) Gaspar Correia, Vasco da Gama's Second voyage, 見馬林·紐伊特編譯：《大發現時代葡萄牙與世界的相遇》，頁10；頁11。
- (12) Hans Mayr, 22 May 1506, Account of the Voyage of D. Francisco de Almeida, Viceroy of India, along the East Coast of Africa, 見馬林·紐伊特編譯：《大發現時代葡萄牙與世界的相遇》，頁14。
- (13) Pero Ferreira Fogaça, 22 December 1506, Letter from Pero Ferreira Fogaça, Captain of Kilwa, to the King, 見馬林·紐伊特編譯：《大發現時代葡萄牙與世界的相遇》，頁41。
- (14) Hans Mayr, 22 May 1506, Account of the Voyage of D. Francisco de Almeida, Viceroy of India, along the East Coast of Africa, 見馬林·紐伊特編譯：《大發現時代葡萄牙與世界的相遇》，頁16。
- (15) 佛朗西斯科·本森科特&迪奧戈·拉馬達·庫多：《1400-1800年葡萄牙的海洋擴張》，頁146。
- (16) 馬林·紐伊特：《1400-1668年葡萄牙海外擴張史》，頁80。
- (17) G. S. P. 弗里曼·葛蘭維爾：《非洲東岸文件選編：從原始時期到19世紀》(G. S. P. Freeman Grenville, *The East African Coast, Selected Documents from the First to the Earlier Nineteenth Century*)，倫敦，1975年英文版，頁123。
- (18) Barbosa, The book of Duarte Barbosa, 見馬林·紐伊特編譯：《大發現時代葡萄牙與世界的相遇》，頁35。
- (19) Diogo de Alcáçova, 20 November 1506, Letter from Diogo de Alcáçova to the King, 見馬林·紐伊特編譯：《大發現時代葡萄牙與世界的相遇》，頁24。
- (20) Pero Vaz Soares, 30 June 1513, Letter from Pero Vaz Soares, Factor of Sofala, to the King, 見馬林·紐伊特編譯：《大發現時代葡萄牙與世界的相遇》，頁43。
- (21) 馬林·紐伊特：《1400-1668年葡萄牙海外擴張史》，頁87。
- (22) L. M. 博羅克雷：《現代世界早期的葡萄牙殖民城市》(Liam Matthew Brockey, *Portuguese Colonial Citie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倫敦，勞特利奇出版社2008年英文版，頁110。
- (23) João dos Santos, Mozambique Island before the Dutch Sieges, 見馬林·紐伊特編譯：《大發現時代葡萄牙與世界的相遇》，頁132。
- (24) Barbosa, The book of Duarte Barbosa, 見馬林·紐伊特：《大發現時代葡萄牙與世界的相遇》，頁35。
- (25) 馬林·紐伊特：《莫桑比克史》(Malyn Newitt, *A History of Mozambique*)，香港，1995年英文版，頁19。
- (26) Diogo do Couto, Barreto's Expedition to Monomotapa, 見馬林·紐伊特編譯：《大發現時代葡萄牙與世界的相遇》，頁68。
- (27) Francisco Monclaro, Journey made by Father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with Francisco Barreto in the Conquest of Monomotapa in the year of 1569, 見馬林·紐伊特編譯：《大發現時代葡萄牙與世界的相遇》，頁70。
- (28) Diogo do Couto, Homem's March to Manica, 1574, 見馬林·紐伊特編譯：《大發現時代葡萄牙與世界的相遇》，頁73。
- (29) João dos Santos, The Portuguese and the Kingdom of Quiteve, 見馬林·紐伊特編譯：《大發現時代葡萄牙與世界的相遇》，頁88。
- (30) 桑賈伊·蘇拉馬尼亞姆，何吉賢譯：《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澳門：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1997年中文版，頁208。
- (31) A. R. 迪士尼：《葡萄牙和葡萄牙帝國歷史：從原始時期到1807年》，頁199。
- (32) 羅蘭·奧利弗：《非洲中世紀(1400-1800)》，頁178。
- (33) Manuel Battetto, Report on the State and Conquest of the Rivers of Cuama in 1665, 見馬林·紐伊特編譯：《大發現時代葡萄牙與世界的相遇》，頁166。
- (34) António Bocarro, Década: Portuguese Wars in Central Afric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見馬林·紐伊特編譯：《大發現時代葡萄牙與世界的相遇》，頁119。
- (35) 馬林·紐伊特：《1400-1668年葡萄牙海外擴張史》，頁112。
- (36) 桑賈伊·蘇拉馬尼亞姆著，何吉賢譯：《葡萄牙帝國在亞洲》，頁207。
- (37) 羅蘭·奧利弗：《非洲中世紀(1400-1800)》，頁176。
- (38) 埃里克·吉伯特&喬納森·T·雷諾茲著，黃磷譯：《非洲史》，三環出版社2007年版，頁232。